



□侯远东

党中央情系东北抗联

今年是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殉国80周年。以杨靖宇、周保中等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广大指战员对党忠诚，勇赴国难，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战斗，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党中央对杨靖宇和东北抗联历来十分重视和关怀，并且给予高度评价。

党中央对联络和支援东北抗联作出部署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出杨靖宇、周保中、赵尚志等共产党员分赴东北各地从事创建抗日武装的工作。杨靖宇等依靠当地党组织，创建了党领导的十几支抗日游击队，并在此基础上陆续组建为东北人民革命军（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顽强的战斗。红军主力长征后，东北抗联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组织联系，1937年底以后，东北抗联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络也完全断绝。为恢复组织联系，中共中央和东北抗联都在进行着艰苦的努力。党中央和毛泽东多次对援助东北抗联作出安排和部署。1935年至1938年，中共中央曾力图派遣关内主力部队的一部分挺进东北。随着全国总抗战的爆发，党中央和毛泽东越来越把东北战场作为全国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加以关注。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将“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作为全国军事总动员的任务之一。1938年

后中共中央又多次派遣联络员到东北寻找和联系东北抗联。1939年1月26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指示，“现在的问题是使中央同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联系”，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任务是“设法找到东北抗日联军，了解它的活动状况”。不久，东北工作委员会在晋察冀边区建立交通站，专门负责联系东北抗日联军的工作，并曾多次派人到东北与抗联联系。1941年8月至1943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三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派干部到东北寻找抗联和进行地下工作问题，并指定陈云等负责选拔干部派往东北。尽管中共中央和东北抗联长期失去组织联系，许多指示也未能及时传达到东北抗联，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东北抗联的重视和关怀。

党中央关怀和爱护东北抗联干部

面对几十倍于己的日本侵略者，东北抗联指战员历尽艰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东北抗联许多干部都曾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爱护。早在中华苏维埃时期，杨靖宇就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7年12月13日，毛泽东签发任命书，任命杨靖宇为由25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七大准备委员会的委员，这是杨靖宇担任过的最高党内职务，充分证明党中央对东北抗联的高度重视和杨靖宇在党内的地位。1941年10月，中共中央在尚不确认杨靖宇已经牺牲的情况

下，推举杨靖宇担任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名誉主席团委员，当时和杨靖宇同时被中共中央提名并担任这一职务的，只有毛泽东和朱德。1958年2月23日，杨靖宇殉国18周年纪念日，党和国家在吉林省通化市刚刚落成的靖宇陵园为杨靖宇将军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安葬大会，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敬献了花圈，中央派代表进行了主祭。毛泽东敬献的花圈上面的挽词是“靖宇同志永垂不朽”。中共中央的悼词中说：“杨靖宇同志英勇奋斗的一生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他对革命最坚决最勇敢，任何困难不能把他压倒。他对党是最忠实的，时时刻刻都尊重党的组织和党的纪律。”

周保中作为东北抗联领导人之一，经历了东北抗日斗争全过程。1949年5月10日，毛泽东接见周保中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的民族英雄来了”。除杨靖宇、周保中外，党中央、毛泽东对其他东北抗日干部也十分关心。1953年3月6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名义，为担任过东北抗联第五军第二任军长、抗联教导旅第四营营长的柴世荣签发了烈士证书，等等。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东北抗联的重视和对抗联干部的关怀、爱护。

党中央高度评价东北抗联的英勇斗争

中共中央的文献和中央领导人的著作、讲话对东北抗联都曾作过高度的评价。早在江西中华苏维埃时期，毛泽东就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名义起草了给东北人民革命军义勇军的慰问电，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对东北抗日军队的关怀。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高度评价杨靖宇等人 and 东北抗联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1938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谈话时说：“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联系。例如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同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东北抗日联军作出了赞誉，精辟地论述了东北抗联的斗争对于全国抗战的价值：“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射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1938年11月5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发出给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同胞的致敬电，称颂东北抗联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

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在听取抗联领导人周保中汇报时，把东北抗联的14年艰苦斗争同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及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一并列为“我党历史上三件最难的事”。1949年5月，毛泽东对东北抗联工作从总体上进行了高度评价，在为党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指出：“抗联干部领导抗联斗争及近年参加东北的斗争是光荣的，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当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这些评价，是对东北抗联历史贡献的充分肯定。

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一直重视和高度评价东北抗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周恩来亲自指示，要从多方面收集资料，编写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中，对东北抗联作出如下概述：“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邓小平为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一书题写了书名。江泽民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的《周保中将军和他的抗联战友》一书题写了书名。200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对东北抗联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上的地位作了充分的肯定。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了中国14年抗战的时间概念。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异常惨烈，“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杰出代表”，对杨靖宇和东北抗联给予高度评价。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东北抗联”英模部队方队，紧随八路军、新四军英模部队方队之后接受检阅。

东北抗联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的一部分，是人民军队光荣历史的一部分。杨靖宇和东北抗联将士们前赴后继、英勇斗争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光辉业绩和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



品读新中国元帅让衔的“理由”

□赵 畅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军队建设史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在评定军衔前，徐向前、罗荣桓、叶剑英等先后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让衔的请求。今天，品读三位新中国元帅提出的让衔“理由”，仍然令人感慨万千，更加增添了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之情。三位元帅让衔自是各执理由，徐向前提出的理由是“既然革命已经成功，不当元帅无所谓”。罗荣桓提出的理由是“自己是做政治工作出身的，没有什么战功，而且入伍晚、贡献小”。而叶剑英提出的理由则是“自己长期担任参谋长职位，多是在后方工作，因此，应该把荣誉让给其他长期在一线指挥作战的同志”。这些让衔的理由，看似有理有据，然而，联系到他们以身许国、出生入死、对党忠诚、战功赫赫的革命经历来考虑，实在经不起“推敲”。当年，毛泽东对三位元帅的功绩就曾有

过很高的评价，而评价的指向无疑是：他们被授予元帅军衔是功配其位，理所当然的。既如此，为何他们三位还要主动提出让衔呢？是故作姿态的表现吗？当然不是。虽说他们各有各的让衔理由，但这些理由都非常诚恳，让人闻之感动，真心实意想让衔是他们的一致言行。而细细品味这些让衔的理由，其特别的“视角”不免让人肃然起敬：徐向前“看重”的是“革命已经成功”，罗荣桓“看低”了自己的战功和资历，叶剑英则更多“看到”的是其他长期在一线指挥作战的同志。在他们三人眼里，只有革命事业和其他同志，唯独没有自己。须知道，评定军衔是对一个革命军人的历史性评价，不但关乎此后的待遇，更是对既往贡献的认可。对个人而言，这可是一件“含金量”很高的、事关名利的大事。然而，得知自己要被授予元帅军衔后，他们都提出让衔，不为名利争短长，这是何等的“无我”境界，

何等的高风亮节！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还有少数领导干部过不了“名利关”。有些干部，只要做了一些本职工作，或是自己抓工作出了一点成绩，就会迫不及待地向组织伸手要待遇要名利。诚然，领导干部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有血有肉之人，而非不食人间烟火之神。在名利面前，领导干部也有普通人的需求和向往，但党的干部首先要坚持党性原则，作为党员自不应拿自己与其他干部和普通群众去比，而是理应比其他干部和普通群众去比，而是其他长期在一线指挥作战的同志。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作贡献。不要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的重要体现，更是我们党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根本。

毛泽东说过：“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品格，古来

如此！”的确，名利就是一面镜子。对待名利的态度和行为，可以照见一个人道德水平的高低、精神境界的高下。在各种名利诱惑面前，作为党员干部，就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平和之心对待“名”、以淡泊之心对待“位”、以知足之心对待“利”、以敬畏之心对待“权”、以精进之心对待“事”，努力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反之，若是唯名利是求，久而久之，则必然心浮气躁，不仅什么实事都干不了，什么好事也干不成，甚至还有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新时代，奋进正当其时。品读三位元帅让衔的“理由”，让今天的我们更加透视了革命先辈的党性修养和精神坐标。作为引领社会发展、担当时代重任的党员干部，更应该向他们学习，要努力保持内心的丰盈、不为名利所困，把严于律己、见贤思齐、敢于担当作为人生的第一选择。

编者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这些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本版将刊发系列文章，对这些思想进行阐释和解读，请广大读者关注。

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

□秦 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这是孔子在参加鲁国的蜡祭仪式后感叹其徒有礼仪形式，失去了“大道”的实质，而后向学生言偃描绘的上古时期大道流行的社会景象。“大道”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道统，是人认识到万事万物对立又统一的自然规律，明了天地万物本来为一体关系的真相，所以胸怀对待任何事物都如同对待自己一样的同理心，也就是“公心”。这样的大道流行于上古三皇、中古夏商周三代圣贤治国理政的时代。“为”读四声，表目的，意思是“为了”。古圣先贤立身行道，为先民谋幸福而无私作为。先民在这样的榜样带动下，生活、劳动同样“为公”不为私。“公”即是“共”，以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各路贤达在众人中成长成材，又被推举出来共同治理社会。

《尚书》上记载，上古时期的尧帝遵循古人流传的天地之道、大公之德，凭借钦、明、文、思四种德行教化人民，实现了天下安定。他诚信、恭谨、克己、礼让，美好的德行传播到四方之外，乃至充塞于天地之间。天下大众受到尧帝德行的感化，因此像尊重日月一般崇敬他，自发地向他学习，每个人都不断完善德行，于是群贤毕至，实现了唐虞时期风俗大和的美好景象。在孔子看来，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都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而行事。德才兼备的人被大家推举出来管理众人之事，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和睦相处，这就是大同世界。

而在孔子之前，西周统治阶层为了天下稳定，就制定了一套严格规范的礼乐制度。“礼”，最初是圣人根据天、效法地的规律而创造，承载着天地之道、大公之德，贯彻在丧、祭、射、御、冠、昏、朝、聘等各种礼仪形式之中，同时也是不同阶层政治、宗法、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准则。人遵循礼，形式上表现为礼仪，实质上上是行道。“乐”是音乐，以德音雅乐培养贵族阶层的情操，使之从内心发出大仁大爱，以公心治国理政。圣人通过礼乐教化，把天地之道明示给百姓，这样治理国家自然成就了大同世界。西周前期，各诸侯国统一于周天子的管理，社会秩序井然有序，万国咸宁。历史上记载，周成王、周康王在位年间天下安定，有四十余年没有出现过犯罪行为，刑罚的器具都废弃不用，被称为“成康之治”。

但是到了周朝末期，周王室开始骄奢淫逸，渐渐腐败。诸侯对周天子不再心悦诚服，便慢慢废弃礼乐制度，竞相争夺天下的人、财、物，发动了大大小小的兼并战争，这就是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从此“礼崩乐坏”，社会秩序被完全打乱。

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正处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他对当时的社会乱象痛心疾首，于是到处拜师求教，寻找救世之方。他曾经向老子问礼。老子感叹，失去“大道”以后，不但人心越来越狭隘，就连美德和礼乐都成了空洞的形式。他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是说，“大道”丧失之后，人们没有了公心，不再以天下为一体，而是为自己的邦国谋取利益，但这样还算存有大德；这种大德丧失之后，人们还懂得“仁者爱人”；丧失仁爱之心以后，人们还懂得讲义务、讲责任；然而丧失责任感以后，就只能依靠礼的形式去规范，表面上维持善的样子而已。

孔子一生学习古圣先贤流传下来的文化，感叹于曾经盛世的美好世界。我们认为，世界各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矛盾，也免不了产生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但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充分讲明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理念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它能够在世界各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